

关于资本主义在
苏联复辟问题

透过社会生活看 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上海汽车电机厂工人理论组

美国《纽约时报》驻苏记者赫·史密斯写了一本叫做《俄国人》的书。书中记述的，都是苏联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尽管作者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从文章所触及的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大权在握，拚命吸工农的血，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侈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工农群众遭受无穷的压迫和剥削，陷入痛苦的深渊。作者说，《俄国人》不涉及俄国政治。这不是政治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俄国人》的作者当然不会掌握这个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虽然罗列了一大堆今日苏联社会生活的现象，但作不出科学的解释。本来，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现象，出现党内资产阶级，都是必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现象要受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要

被打倒，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苏联显然不是如此。为什么苏联的特权阶级可以横行霸道，吸工农的血而不受惩罚？为什么苏联经济生活中如此长期、普遍地连厨房用锅、调羹这一类“最基本的物品都没有”？为什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泛滥成灾？为什么“你只靠工资吃饭”在苏联成了一句羞辱人的话？为什么吸毒、酗酒、牛仔褲、超短裙如此众多？为什么“波卡茹卡（弄虚作假）成了人们处世的准则”？……透过所有这些现象，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今天已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下，已成了各族人民的监狱。这同无产阶级专政下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现象必然受到批判、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受到斗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根本的区别就是，苏联已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在苏联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从这个社会产生的某些社会现象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由于它不利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要反一下的。苏联不是也成立了什么“反贪污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办公室”吗？这不过是玩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把戏，即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也。“贪污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头目是谁？就是新沙皇，就是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把这个反革命的阶级打倒，苏联人民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苏修叛徒集团是当代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反面教员的身上，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教益。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持续进行批判，不断加以限制，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

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泛滥成灾。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官们，他们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资产阶级，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如果放松了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充分认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不懂得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它们的方法，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复辟。抓住了党内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就能够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

俄 国 人

〔美〕赫·史密斯

一、人 和 生 活

和外国人会见的场合

任何不同的社会都想掩饰它的问题，也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对外宾施加影响。然而苏联社会，由于它那典型的信念，特别自命不凡。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没有什么能比俄国人这个戏剧性的行动更能证明我所说的话了。一九七二年夏天，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苏联进行的那次著名的访问之前，俄国人导演了这出戏。他们企图以改变莫斯科的市容来博取来宾的好感。

这一年夏天，大批破烂陈旧的建筑物被拆掉了。几百名居民搬到了别处，许多街道也重新进行修建，整幢整幢的大楼油漆一新。就在尼克松到达莫斯科的那天晚上，没有树的地方出现了树，原来的空地也种上了树，并摆上了花盆。就连我们居住的楼房，虽然远离克里姆林宫，但唯恐尼克松的车队可能经过，因而它的外表也被装饰一新。

象现在这样的搞法，远可追溯到沙皇时代。当时俄国人把它叫作“波将金”。“波将金”是一位俄国皇太子的名字，他曾在

作者曾任美国《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三年。——译者

当时叶卡德琳娜女皇的车队沿途经过的地方，建造了许多假的庄园，妄图以他管辖地区的繁荣和兴旺来博得女皇的欢心。至于今天，俄国人则把这种行为叫作“波卡茹卡”，意思就是弄虚作假，装潢门面。

没有菜的菜单

“波卡茹卡”在苏联是包罗万象的。从硬通货商店到陈列在著名的国营百货商店橱窗里昂贵的进口货（这些商品通常在店里是买不到的），从经常安排外宾去参观的典型农庄和工厂，到很小的事情，都是如此。就拿你在旅馆中看到的厚厚的一本菜单来说吧，这些印在白道林纸上的菜单，用四种语言写着几十种精美的菜名。客人只有在吃饭点菜时，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实有的菜只占菜单上所列的三分之一不到。

著名的电影制片商索尔·霍罗克的同事曾对我说过，每当霍罗克先生坐上旅馆的餐桌时，领班便向他递来菜单。当他向领班点菜时，回答总是这么一句话：“别管菜单，你想吃点啥？”这时他便答道：“你直说吧，你们今天有啥菜？”

民族游戏

记得偶然有一次机会，使我能亲眼目睹“波卡茹卡”的前前后后。那时，我正在巴库游览，住在里海边的宾馆里。有一天，上面给宾馆里来了指示，说由外国使节组成的参观团已经出发前来这个地区进行正式访问。顷刻间，这一消息使得宾馆里的人如临大敌，从经理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倾巢而出，迅速安排布置宾馆，以便应付代表团的参观。

管走廊的妇女，收起所有的房门钥匙，把它交给用金粉重新书写房间号码的人；电工东张西望，换下烧坏的灯泡；清洁女工卷起袖子，洗刷门窗，扫除灰尘；宾馆大门和通往宾馆的海滨大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

餐桌上普通的玻璃烟灰缸即刻消失，代之以又新又漂亮的烟灰缸。在插满白丁香的大花瓶旁边，放着新的菜单。它比原来的菜单更精致、更漂亮，菜的价钱也更贵。

在美国 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掩人耳目、弄虚作假”然而苏联人却把它叫作“民族游戏”。

推心置腹的交谈

同许多人一样，我曾同别人围坐在铺着绿色台毯的桌子旁，进行长时间的谨慎小心的谈话，这种铺着绿色台毯的桌子在苏联每家公司里都能见到。此外，我还同苏联的一些官员进行过另一种避人耳目的谈话。他们向我诉说了内心的秘密，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他们内心的哲学思想，或者出于对这种虚伪的表面现象感到厌倦。确实，谈论政治在苏联也许是不允许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俄国人也同其他人一样喜欢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且还会在谈话中暴露不少社会的真相。

比如有一次，我乘汽车横越高加索，作了一次长途旅行。陪同我的是一位女翻译。她一方面协助我工作，另一方面却不让我更多地了解一些苏联生活的真相。但她曾忧郁地向我诉说过作为一个参加工作的妇女的苦衷，以及一般苏联妇女的艰难生活。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商业展览会里，我曾遇到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很希望谈论当今苏联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问题。他向我谈到要把他的子女培养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实在困难，因

为他们都向往西方的音乐。

一个管理外国人旅游和外国记者事务的苏联情报部人员，在他的办公室里惊奇地向我谈论了非常文明的美国生活，他还得意地给我看他最近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别致的西装和色彩鲜艳的宽领带。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我不能一一提及，唯恐给他们带来不测。总之，俄国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在非正式场合，他们经常会流露出一些心灵深处的人性的东西。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所以对他们的控制很严格，他们的负责人除集体外也很少单独会见外宾。

不受限制的四种人

对于接触外国人，苏联当局给官员们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受它的限制。这些人往往带有个人的动机，谈吐也比较直爽、坦率。他们就是苏联企业里的知识分子、青年、地下画家、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移民。

一些企业里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获得一种西方称之为自由者的声誉。他们千方百计想搞到访问美国的邀请，或者在美国使馆中喝姜汁酒和威士忌。当然，对于同使馆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是注意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在一些青年人的眼中，最向往的就是买到一条你碰到他们时穿的那种牛仔裤，或者是最流行的西方唱片。

一些画家最关心的是出售他们自己的作品。

而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移民，最重视的则是诉说他们的苦处。尽管如此，我发现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你可以倾听他们的见解，和他们交谈，他们是能够看到社会的黑暗面，并真诚地

渴望和外界联系、交流思想和经验的。

他们为什么向我诉苦

我所担任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职务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使我能比其他外国记者有着更多的机会同《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苏联报纸的高级记者接触。同这些记者接触 尤其是同他们中出过国的人接触，是有益的。因为这些人比起那些不高兴西方记者在场、同时一般也很难接近的苏联官员来说，要随便多了。

当然，他们在同国外同行进行的竞争中，还很注意维护自己和职业的尊严的。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纽约时报》分社社长的这个职务甚至对我同普通的苏联公民相处、接触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苏联报纸经常转载《纽约时报》的消息，作为博取人们相信它的新闻报道的一种手段。更何况《纽约时报》对于俄国人来说 是众所周知的。同时，我很想亲自去了解人们。我碰到过少数人，他们见到我会立刻警惕起来；但其他人，尽管他们当中有人 会用防备的口气说：“哎，记者！”却常会显露出他们的关心和好奇。有些人甚至还愿意告诉我一些小秘密，或者向我诉说他们的苦处。他们感到只要不说出他们的身份——至少不对我说出来，他们就可以向我透露内心的秘密。而这类事情如果碰在苏联记者手里，便截然相反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年妇女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再三要求会见我，我犹豫了好久之后，终于去了。她向我叙述了她和她那个残废的丈夫和公公怎样共同住在一间房门很大的房间里，这和通常的居住常识是不相称的。但一些官员们却拒绝为他们安排一间较好的住房。说真的，她的勇敢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

程度。因为她不仅上告党中央，而且还想说服我把她的苦痛写出来。这样，苏联当局就不得不解决她家的住房问题了。而我的看法正好同她相反，我对她说，把她的遭遇和名字一起写出来，那将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

某日晚上，一个晓得我电话号码的人打电话来，用波罗的海一带的口音告诉我，他在走近美国大使馆时怎样遭到苏联警卫的虐待，但话还没有讲完，电话就突然中断了。

离莫斯科越远，控制越松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在苏联各地同人们的偶然会见。我和我的妻子发现，离开莫斯科越远，那种对苏联人心中受压抑、受原则和信条灌输的感觉就越少。比如格鲁吉亚、立陶宛、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的人，比起政治上过敏的莫斯科人要爽直得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隐瞒对苏联当局的批评和公开的对立情绪，而问题是需要寻找合适的谈话地点和时间，不论是在饭店、剧场，还是在火车上、机场内都是如此。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般出远门总是比较急的，而我们在苏联则常乘火车，因为乘火车可以休息得比较好，并有机会了解人们。

有一次，我和一个国营小农场的经理在餐车里聊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一起饮苦啤酒、喝罗宋汤。他向我叙述了怎样通过私养一群羊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财致富。

又有一次，我在拉脱维亚遇到一个戴阔边眼镜的工程师。他告诉我曾在某地看到过一则消息，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眼镜，能纠正色盲，并要我帮他搞一副……最后，他向我谈起了苏联建筑

工具存在的弱点。

有一天，我在高加索山区的巴库-第比利斯一路游览，一个建筑工人向我透露了申请到国外工作的手续：先是要经过长期的安全审查和思想教育，最后才能获准出国，在国外赚钱。

我还长时间地同两个苏联战斗机司令部的飞行员一起玩过乒乓球，其中一个喝了许多伏特加和威士忌，还因为我的妻子和他妹妹同名而拥抱了她。他还不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那么你是真正的美国人罗？”因为在此之前，除了在冷战时期被苏联人打下来的美国侦察机飞行员外，他没有再见到过其他美国人。

就这样，我和我的妻子相继了解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生活侧面。那些接踵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们，有的已成了我们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只因为有叔叔或舅舅在美国旧金山而本能地邀请我们出席婚礼或婚礼后专门为我们安排一些较长的庆祝会；还有那个神经质的爱沙尼亚画家，我们曾向他买过几幅现代画。

尽管如此，在这些会见中，还有某种东西使我们难以冲破那不信任和恐惧的障碍，难以碰到人们的热情，而这些热情本来是可以使那些会见成为十分珍贵和难得的机会的。

当然，问题不在于不能同苏联人民接触，问题在于苏联当局决心要花费许多精力来阻止那种多半没有经过事先安排的接触。我指的是那种不是为了友谊、而是为了打听内幕的接触。

二、特权阶层

苏联的特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章：根据官衔的大小决定享有的特权。

排在名单最前面的有苏共政治局的首脑、党内有相当权势的中央委员、各部的部长，以及为数不多的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他们每月领取的“克里姆林宫津贴”足够供他们一家人大吃大喝。

与此相反，一个有四口人的城市家庭每月需要花费一百八十到二百左右卢布，其中花在吃的上面就得占去收入的一半。

最高级领导人享受送货上门的待遇，或者可以到设在克里姆林宫及党中央内部的专门商店领取他们的物品；部长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在政府大楼专为他们设立的商店中领取物品，这是一幢座落在别尔谢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灰色建筑；那些一九二〇年以前入党、现已退休的老布尔什维克，则可到库米苏姆大街上的一家三层楼的专门商店里领取克里姆林宫特别供应的物品。这些物品的价格、质量则按享有者的地位高低而分成若干等级。

特殊商店、食堂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卖减价食品的商店。它专向元帅、海军将领、高级科学家、宇宙航行者、经济管理人员、获得高级勋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芭蕾舞明星、

《真理报》和《消息报》或其他重要刊物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市的领导人销售廉价食品。

一个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告诉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成三种等级，因而要分别在三家不同等级的商店里买东西，到设在党的总部的食堂吃饭，饭菜也是严格地按等级制度供应的。

党的机关和主要部委、武装部队司令部、秘密警察机构的中层干部都在奢侈品较少一些的中级商店里买东西，而他们付的钱却要比大头头多。

配给卡上的“限额”

许多政府机关还发给高级官员“特殊配给卡”，凭卡可以到首都的特殊商店里买东西。一个官僚对我说，在这种商店买东西的官员，可以购买的钱数，都按照级别有一定的规定，并标明在卡片上。但限额的钱数对他们的部属是保密的。

在莫斯科最大的商店——“国营莫斯科百货公司”的三楼上，开设了一个代号‘一〇〇’的柜台，专门供应特权阶层时髦的服装。

加里宁大街上的“陆海军大厦”里，有专为军官开设的秘密销售柜。

在莫斯科，有一大批秘密地为首都的特权阶层服务的裁缝铺、理发馆、洗染店、照相馆等等。一位能在这些地方进出的人告诉我，这些店铺，倘若加上食品店的话，总计可达到一百家之多。

一名借了她有权势的朋友的光而刚秘密走访了一家特殊商店的中年女记者对我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觉得我

要把商店里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这时她丈夫接过话题，讥讽地说：“共产主义嘛，对于他们来说，早就实现了。”

卢布证券

苏联社会还有另一种特权：在莫斯科开设了八家硬通货商店。持有“卢布证券”的俄国人能在这里买到廉价的进口货或俄国的稀有商品。

“卢布证券”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工作挣了钱而把外汇兑换成卢布的苏联人，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记者和诗人等。有特殊门道的政府官员的部分薪金也用这种证券支付。在黑市上，一个“卢布证券”可以换八个普通卢布。

几乎所有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苏联人，如旅游向导、政府部门的翻译、陪同外宾的记者、教外国使馆人员俄文的教师，他们的部分工资也用“卢布证券”支付。这样就可买到进口围巾、考究的衬衣、阔气的领带或皮鞋，来为自己一般的苏式衣着添上一点优雅的色彩。

不少俄国人对于这些不收苏联货币、专门销售奢侈品的商店感到极其恼火。我曾听到一位知识分子这样讲：“在我们国家内，竟有如此不收国币的商店，简直是一种耻辱！”可是实际上，这种商店还不仅限于不收国币，而且不接待俄国人民，警卫人员阻止没有出入证的俄国人进入任何一家这样的特殊商店。特权阶层独占特权的制度，已引起了许多俄国人的愤慨，因为它违反了确认的社会主义平等的原则。

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特殊商店，不仅是特权制度的标志，也是它的一个缩影。它专门向政界首脑，或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开放，而对普通公民则摈之门外。

通常，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无论是铸工，还是屠夫，只要他愿意付钱，就能买到一部卡特勒克大轿车，吃上一顿佳肴，包一套豪华旅馆中的房间。但是在俄国则不然。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伯鲁夫·迪杰莱斯的话来说，任何一种高档品，都属于那些“享有特权、领取高薪的阶层，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权力”。

超阶级的阶层

在苏联有一大批享有特权的新贵，他们的人数有一百多万，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几百万，但它的确切人数在苏联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俄国人承认存在这么一批人。照官方的说法，苏联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还有一个包括职员和知识分子在内的雇员阶层，其人数据西方学者估计，约在一千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正是这一知识界的上层，构成了实际上的特权阶级，其核心是管理国家和政府的官僚，再加上高级经济管理人员、科学界有权势的行政官员、党报及宣传系统的主管人。

这种制度的神经中枢，苏联人管它叫“诺明克拉托拉”。这个词无法翻译出来，它实际上就是“花名册”，就是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担任大部分主要职务的人员的名单。在苏联，从乡村到克里姆林宫，各级组织都有这种“花名册”。

特权名单

“花名册”的前头是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他们的职务是由苏联最高统治者直接指派的，接着是各部的部长、科学院院长，《真

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领导人，最敏感的一些部的部长，驻美大使和另外几个主要大使以及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这个比华盛顿白宫班子的权力还要大得多的书记处，它指派大批人担任一些看上去地位似乎并不高，但却是异常重要的职务。按照这一程序，一级指定一级，直到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以及各个村庄，形成了一个任意授与官职的庞大的系统。

“花名册”也是秘密制定的。小职员不能沾光，只有那些领导人或在党内有职务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

在俄国，还有另一条通向上层地位和享受特权的途径，那就是在增强国力、为国争光上施展出显著的个人才能，如大科学家、芭蕾舞明星、宇航员、奥林匹克冠军、闻名的小提琴家、有名望的军事将领，他们都能在上层占有地位，但仅仅是地位而不是权力，这就是政界的上层同其他阶层的基本区别。

虽然文化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在显示苏联的力量和成就方面效力不小，但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还必须表示忠诚。党独揽奖赏大权，既可以给他们大量奖金，又可以授与他们保证过舒适生活的勋章和头衔。

党 在 惩 罚

党还行使惩罚之权。它能随意撤销以前的正式决定。不许索尔仁尼琴获列宁奖金就是一例。它也能收回已赏给的特权，倘若触犯了它的利益的话。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辩护者——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罗奇斯拉夫·罗斯特鲁布斯基出国旅行以及在国内演出的权利就是一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表彰所取得的成就，和收买那些已成名的人，党的官僚机关总是授与文化科

学界的名流以“人民艺术家”或“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并且赐给他们享有舒适的乡间别墅这样的特权。这种做法和当年俄国沙皇的做法如出一辙。对于那些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沙皇赐给他们庄园和头衔。

也许，头目们的地位和特权最明显地表现在拥有配备司机的小汽车上。这种小汽车用灰色的窗帘遮住车窗，使行人无法知道乘坐的是哪位显赫人物。它行驶于马路中央，警察看到它们开来，马上就得指挥其他车辆让路。

当一辆载着某一头目的汽车开出克里姆林宫大门，穿过那条通往勃列日涅夫寓所的马路，驶向这些头目们居住的绿树成荫的别墅区的时候，一个站在捷列姆诺夫斯基大街边上的警察便鸣笛向交通警示，阻止其他汽车通行。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指示通过无线电相继传到下一个岗亭。

“吉尔牌”和“海鸥牌”

上层的精华大约共有二十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他们使用黑色的“吉尔牌”小轿车，每辆约值七万五千美元。一次，我对一辆停着的“吉尔牌”的车内扫了一眼，但是马上就有一位保安人员前来要我离开。这种轿车的车身是长形的，样子象“林肯大陆牌”轿车，里面非常豪华，有软垫椅、长毛绒地毯、空气调节器、无线电话以及其他奢侈品。

一位工程师告诉我，当时斯大林乘坐的六辆车中就有五辆是“吉尔牌”，另一辆是老式但豪华的“巴卡尔”牌轿车。为了使人们搞不清他到底坐的是哪一辆，所以他每次外出时都换乘不同牌子的轿车。到赫鲁晓夫执政时，他把自己的车队改成四辆。自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心怀不满的陆军中尉从克里

姆林宫鲍罗维茨基门向勃列日涅夫的轿车开枪射击以后，勃列日涅夫出行时车队也改由四辆轿车组成。

对于那些资格还够不上坐“吉尔牌”轿车的二流人物来说，“海鸥牌”轿车是牌子最好的了。它车身大，象五十年代“巴卡尔”牌的载重车。在一些主要街道上，专门划出了中间行车线，供主要人物的轿车行驶，人们常把这种行车线称作“海鸥牌行车线”因为“海鸥牌”轿车经常在这条线上行驶。

能坐“海鸥牌”轿车的人是政府部长、元帅以及来访的重要外宾和代表团。有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和企业家也用每辆一万三千美元的价钱购买了这种轿车。通常，俄国人在举行婚礼时也租用“海鸥牌”轿车。